



“禹兴西羌”传说的史源重构与文本演变

吴玉贵 陈 卓

摘 要: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文论说帝业常兴于西北时引述“禹兴西羌”传说,这是正史中最早将夏禹与西羌联系起来的记载。“禹兴西羌”传说,学界多以其源出汉初陆贾《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未明陆贾很可能化用《孟子·离娄下》之言而为此说。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以及清人焦循《孟子正义》对此传说出自《孟子》早有提示,惜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在汉魏至唐宋的流传过程中,此传说呈现出两种较为明显的文本系统。一种是禹兴西羌的叙述主体保持不变,常被用来阐释帝王圣贤之道;另一种是在禹兴西羌的基础上,对大禹相关传说陆续增补,如父系、母系信息和大禹降生传说等具体描述,并且增添了较为鲜明的蜀地色彩,后世流传的大禹传说即多本于此。《史记·夏本纪》《后汉书·西羌传》均未采录此传说,两者虽然史料来源不同,但不难看出司马迁和范曄对此传说的审慎态度。

关键词:《史记·六国年表》;《孟子》;“禹兴西羌”传说;史源;文本系统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4-0083-07

《史记·六国年表》序文引述“禹兴西羌”传说,这是正史中最早将夏禹与西羌联系起来的记载。以往学者研治夏史,对“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传说多有考证,尤以考辨“禹生石纽”为主。冯汉骥《禹生石纽辨》最早对大禹出生地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证^①,后经李学勤、谭继和、蒙默等学者续论^②,禹生石纽传说出自蜀人附会基本已无争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信《六国年表》“禹兴西羌”传说以为史实者不在少数,如徐中舒就曾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③,几乎同时出版的《羌族史》虽然提出相关材料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讨论传说时代夏禹与西羌关系时仍重点引述了徐氏的观点^④。

近年来,学界对“禹兴西羌”传说既往研究有所反思,提出从传说生成和神话叙事进行研究的新视角,着重探讨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⑤。随着王明珂华夏边缘理论引入羌族史研究^⑥,学

界延伸出以边缘视角进行地方社会考察和对传说历史本相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⑦,同时产生了以中国认同理解秦汉时代大禹传说的新视角^⑧。新视角固然推动了对大禹传说的认识,然而在传说溯源方面,学界大都认同司马迁所引“禹兴西羌”说源出汉初陆贾《新语》“大禹出于西羌”,却未曾进一步推考陆贾所据何书。

本文通过史源分析,意在辨明陆贾很可能较早化用《孟子·离娄下》而为此说,皇甫谧言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之语出自孟子亦非空穴来风,而以此语不见于《孟子》为由否定皇甫谧之说可靠性的观点值得商榷。在汉魏至唐宋“禹兴西羌”传说的流传和演变过程中,该传说呈现出两种较为清晰的文本系统。因此,进一步探索“禹兴西羌”传说的史源和流传情况,对我们理解司马迁《六国年表》引述此传说的立场仍有必要。

收稿日期:2025-11-05

作者简介:吴玉贵,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200433),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陈卓,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一、《六国年表》“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解

太史公据《秦记》总结秦兴之由，目的是“著诸所闻兴坏之端”，故成《六国年表》一篇，其序文略曰：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1]685-686}

“或曰”以下是《六国年表》对秦兴“盖若天所助焉”的解释。具体到史论部分“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以“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秦、汉分别兴自丰镐、雍州、蜀汉，阐明帝业常兴于西北的观点，其中唯独夏禹兴于西羌的说法似无从稽考。司马迁《六国年表》引述此传说作为论证的主体，即“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句，即以物始生于东方而收获于西方，作为“禹兴西羌”的理论根据。明晰“或曰”句可能的史料来源以及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司马迁于《六国年表》序文中引述“禹兴西羌”传说的用意。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文末以“太史公曰”的口吻，表明了他对黄帝传说这类史料的态度：

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46}

从这段议论中可知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黄帝史事多有散佚，相关传说多见于“百家”与“他说”，且雅与不雅者并存，太史公经过系统论次，“择其言尤雅者”而成《五帝本纪》。

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论述秦文公作鄠畤用

三牲郊祭白帝事时，再次以“或曰”的形式论及黄帝史事，“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1]1359}。这里指出雍州立畤的传统可以向前追溯至黄帝，并认为“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这与《五帝本纪》所叙百家言黄帝的“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等同视之，反映出司马迁引据“或曰”的黄帝传说史料，很可能来自“百家”与“他说”。由此类推，《六国年表》序文“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很可能与《五帝本纪》《封禅书》一样，都出自汉代流传的“百家”与“他说”。

从具体内容来看，“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应受到汉初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说的影响。《汉书·五行志》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说曰：木，东方也……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2]《白虎通》总论五行，阐释稍详：“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触地而出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何以知东方生？《乐记》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3]《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的观念，与阴阳五行说东方“万物始生”，西方“万物既成”二者若合符契，明显是后者影响下的产物。

《六国年表》在“或曰”句下，还排列了禹、汤、周、秦、汉的兴替顺序。《封禅书》论述秦始皇并天下称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1]1366}《吕氏春秋·应同》也记载：“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4]

稍加对比可知,《封禅书》与《吕氏春秋·应同》应出自同一史源,即阐述黄帝(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的五德兴替。论述五德相生相替,《封禅书》的表述与《六国年表》基本相同^⑨,只是《封禅书》在秦始皇称帝下论述此事,故止于秦;《六国年表》论秦兴之由可为汉世鉴,因及于汉。两种记载都是以战国至汉初流行的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代政权的更替。

通过分析《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以及《封禅书》“或曰”句引述黄帝史料的特点,可以推测《六国年表》序文“或曰”句很可能出自汉初的“百家”与“他说”;至于司马迁史论,即“或曰”句以下依次序列禹、汤、周、秦、汉帝业之兴,其思想根源则是战国至汉初流行的阴阳五行、五德终始说。

二、“禹兴西羌”传说的史源辨析

《六国年表》序文采用“禹兴西羌”传说,意味着此传说在汉初已经流行。对《六国年表》序文“故禹兴于西羌”句,裴骃在“集解”中引西晋皇甫谧注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1]686}这里最早论称“禹生石纽,西夷人”言语出孟子。学界多以汉初陆贾《新语》“大禹出于西羌”为司马迁《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所本,但对陆贾《新语》的史源鲜有进一步推考。

冯汉骥《禹生石纽辨》一文最早注意到汉初陆贾《新语》、司马迁《六国年表》均采“禹兴西羌”传说,认为太史公引述“禹兴于西羌”传说源出陆贾^⑩。相较于“禹兴西羌”说,“禹生石纽”说的记载丰富且具体,因而学界更多关注“禹生石纽”传说的考辨,对“禹兴西羌”的认识大多停留于冯氏之论,未能探明陆贾《新语》“大禹出于西羌”究竟语出何处。裴骃《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注称此传说语出孟子,但学者多以今本《孟子》不载此言,继而否定皇甫谧之说。值得注意的

是,清人焦循《孟子正义》提示陆贾《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句“此本《孟子》”^{[5]540},惜未详论,裴骃及焦循的观点亦未能为学界广泛接受。进一步追溯陆贾“大禹出于西羌”说的史源,可以发现《新语》或较早化用《孟子》而为此说。

《孟子·离娄下》曰: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5]537-540}

陆贾《新语·术事》作:

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6]

《孟子·离娄下》称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未言及夏禹。“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句以下,所论不管地去千里,还是世隔千岁,圣王之道一也。陆贾《新语·术事》论圣贤之道称“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实与《孟子》相合。且《孟子》《新语》都强调“王道”的重要性,即“不论什么出身,不论什么时代和地域,能行王道则可以成为中国的圣王”^⑪,两段记载论说主旨亦相契合。

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认为《新语·术事》与《孟子·离娄下》一段“语意类同”,由此推考《新语》“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始于先秦,并认为“司马迁讲‘禹兴于西羌’应该也是由此而来”。虽然此说肯定了司马迁“禹兴于西羌”本自陆贾《新语》,并推测此传说的史源“一定始于先秦”,然而对皇甫谧引《孟子》称禹生石纽云云,却持怀疑的态度,并称皇甫谧“他大概是把陆贾的话误记成孟子了”^⑫,因此并未将此传说的史源追溯至孟子。事实上,《新语·术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仅载东夷和西羌,并未提及皇甫谧引《孟子》所称的“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因而李学勤称皇甫谧误记陆贾为孟子的说法并不成立。还有学者以白马传说为《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和“集解”引孟子

语“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说的最早源头^③,似与古代氏族传说相混淆。

司马迁《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本自陆贾《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当无太大异议,这从司马迁熟读《新语》及其《六国年表》与《新语》相同的撰著目的可知。《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曾对陆贾言“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2699},陆贾遂成《新语》一书。太史公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1]2705},可见司马迁必当谙熟陆贾《新语》。《新语》既成书在前,那同样出于总结秦兴之由,“著诸所闻兴坏之端”^{[1]687}目的而撰作的《六国年表》,采录“大禹出于西羌”并改作“禹兴于西羌”便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孟子》以舜东夷人、文王西夷人对举,陆贾《新语》中的表述变为“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稍晚成书的《盐铁论》亦采此说,文字又稍变作“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7]。无论是《新语》“文王生于东夷”,还是《盐铁论》“文王生北夷”,显然都有违文王生地的史实,但就议论文字本身而言,均作为“禹出西羌”核心内容相对举的例证。也就是说,陆贾很可能为追求文字工整,以“文王一大禹”“东夷一西羌”作为对仗,而忽略“文王生于东夷”有违史实的问题。尽管如此,《孟子》《新语》在“行王道可为圣王”这一主旨上,则基本一致。

综上,陆贾对文字内容的处置虽称不上严谨,但这丝毫不影响陆贾《新语》较早化用《孟子·离娄下》而作“大禹出于西羌”的可能。此说后为太史公采录,《史记·六国年表》遂作“禹兴于西羌”。由《新语》《六国年表》以及《盐铁论》均采此传说,可推知此传说在汉初广泛流传的事实。至于皇甫谧注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内容则涉及“禹兴西羌”传说文本形态的变化。

三、汉魏至唐宋“禹兴西羌”传说的流传及演变

自陆贾《新语》、司马迁《六国年表》采录禹出西羌传说以来,在由汉魏至唐宋的流传过程中,该传说呈现出两种较为明显的文本系统。

一种是禹出西羌的叙述主体保持不变,内容多论帝王圣贤之道,此种说法应当本自陆贾《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说;另一种是在保留禹出西羌的基础上,对大禹传说陆续增补,其增补内容不仅包括父系、母系和大禹降生传说的具体描述,还有着较为鲜明的蜀地色彩。

首先,史籍包括佛典常利用禹出西羌传说以阐释圣贤之道。如范晔《后汉书·戴良传》记载,东汉戴良恃己才高,遂自比于孔子、大禹,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8]2773},内容基本合于陆贾《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只是《戴良传》以“仲尼长东鲁”与“大禹出西羌”对举的表述方式,应受到陆贾《新语》的影响。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魏晋时人蔡洪言,“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9],与陆贾《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义同而辞异。释僧祐《弘明集·牟子理惑》载:“禹出西羌而圣哲,瞽叟生舜而顽嚚。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10]30}《弘明论后序》又称:“夫禹出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丘欲居夷,聘适西戎,道之所在,宁选于地。夫以俗圣设教,犹不系于华夷,况佛统大千,岂限化于西域哉。”^{[10]800}可见,南朝梁释僧祐论圣哲事亦多采禹出西羌说。

其次,结合字面及上下文意可知,陆贾《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说,认为帝王之道应超越华夷之辨,正如古代圣王的文王、大禹分属远离王朝中心的东夷和西羌。因而当中原王朝受到四夷的挑战时,“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又衍化为对天命归属的论据。企图割据一方建立政权的“胡人”,往往从宣称古代圣王出于夷狄的角度,寻找“胡人”亦可为天子的合法性。永嘉之乱起,匈奴人刘渊声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11]2649}。鲜卑人慕容廆在劝说高瞻为己效力,匡扶晋室时亦称:“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11]2813}《晋书·邵续传》记载邵续为石季龙所俘,羯人石勒令使者徐光让“以夷狄不足为君邪”对其责问,邵续机敏地用“周文生于

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11]1705 对答,假言称赞石勒。前引《晋书》诸条记载,反映出大禹出于西羌传说在十六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事实。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刘渊、慕容廆、石勒均为“胡人”而建立政权,他们在塑造政权合法性时,无一例外都利用陆贾《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一说,借由华夷均可作为圣王的表层意涵宣称古代圣王多有出于夷狄者。以上是“禹兴西羌”传说的第一种文本系统。

“禹兴西羌”传说在由汉魏至唐宋的流传过程中内容不断丰富,其文本形态也有所变化。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叙夏禹后裔越王无余事:“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颛顼之后。鯀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12]《越王无余外传》在保留“家于西羌”的基础上,补充了夏禹父母世系传说的记述,增添了禹的降生地点等信息,尤其“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带有十分鲜明的蜀地色彩。

“禹兴西羌”传说在蜀地具体化的体现,可通过扬雄《蜀王本纪》、陈寿《三国志·蜀书》以及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管窥一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1]49《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引述夏禹事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松之注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剖儿坪,见《世帝纪》。”^[13]可见,《蜀王本纪》《蜀本纪》《三国志》仅载禹生石纽的传说,其核心文本亦只有汶山、广柔县、石纽等地名,未有禹出西羌的记载。至皇甫谧《帝王世纪》“长于西羌,(西)夷人也”^[14],才将禹出西羌及与夷人关系的记载补入传说。

裴骃《史记集解》注《六国年表》序文“故禹兴于西羌”句,引述西晋皇甫谧言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当出自《帝王世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南宋后已无传本,后人所辑多本唐宋时期的类书。以下即条列类书中《帝王世纪》所载的“禹兴西羌”

传说,观察魏晋以降传说内容的变化。

《初学记》引《帝王世纪》曰:

禹,姁姓也……颛顼生鯀,尧封为崇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见流星贯昴,又吞神珠,意感而生禹于石纽。名文命,字高密。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尧命以为司空,继鯀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尧美其绩,乃赐姓姁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15]

《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曰:

伯禹,夏后氏,姁姓也。生于石塢。虎鼻大口,两耳参漏,首戴钩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尧命以为司空,继鯀治水……尧美其绩,乃赐姓姁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16]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曰:

伯禹夏后氏,姁姓也。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于石纽……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人。^[17]

此外,《史记·夏本纪》叙夏禹“名曰文命”句下,张守节《史记正义》亦引皇甫谧《帝王纪》(即《帝王世纪》)称:“《帝王纪》云:父鯀妻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也。”^[1]49

由上可知,唐宋时期类书保存的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大禹传说的文本形态趋于稳定。值得注意的是,禹出西羌的核心元素虽得以保留,但与汉初陆贾《新语》“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已有显著区别。汉初流行的“禹兴西羌”传说,本无大禹出生地石纽和(西)夷人的记载,至扬雄《蜀王本纪》和谯周《蜀本纪》补入禹生石纽传说,对大禹降生地“石纽”的记述,显然已渗透着浓厚的蜀地特色。到《吴越春秋》《帝王世纪》时变为“家于西羌”和“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又补入(西)夷人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华阳国志》虽较《帝王世纪》稍稍晚出,其中除保留有禹生石纽以及夷人的核心元素外,对禹与夷人传说的记载尤详。

刘昭注《后汉书·蜀郡》记载广柔县时引《华阳国志》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祐之。”^{[8]3509}

《水经注·沫水》“沫水出广柔徼外”条，郦注同引《华阳国志》，与刘昭注引《华阳国志》当出自同一史源，其文稍异：“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18]

综上所述，自汉初陆贾《新语》、司马迁《六国年表》采录禹出西羌传说以来，在由汉魏至唐宋的流传过程中，大禹传说不断补入新的内容，如扬雄《蜀王本纪》、谯周《蜀本纪》和《吴越春秋》记载的禹生石纽传说，以及皇甫谧《帝王世纪》、常璩《华阳国志》保留的夷人传说等等，推测增补内容应主要来自蜀地的古史传说。到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时大禹传说的主体内容和框架基本固定，内容上不仅包括“禹兴西羌”传说，更补充了大禹父系、母系以及降生传说，增加了石纽以及夷人等不少细节，后世流传的大禹传说即多本于此。

结 语

《史记·夏本纪》对夏史作了系统阐述，但其多叙述大禹治水的传说，并未提及“禹兴西羌”的传说，这与《六国年表》引述此传说的做法不同。《夏本纪》叙大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治水而天下平，是为表彰古代圣王之一夏禹的功绩，其史料来源主要是《尚书》。司马迁撰写《六国年表》则是为了阐明帝业常兴于西北，从而总结秦政权兴亡之由以为后世鉴。体例和史料来源的不同，决定了此传说未能进入夏禹历史的正统叙事中。范曄《西羌传》综合诸家“后汉书”对西羌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传前总序记述夏时羌戎事，亦未采此传说。笔者认为范曄《西羌传》在诸家“后汉书”的基础上系统阐述西羌发展的历史，对夏时羌戎事的追溯，其史料来源主要是《竹书纪年》，因此亦未采录“禹兴西羌”传说。司马迁、范曄对“禹兴西羌”传说取舍的审慎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传说”的史

料性质决定的。

传说并非信史，这一点自不待言。然而“传说仍有其属于历史之一面”^⑩，王国维亦称“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⑪。换言之，传说亦为历史的产物。然在流传过程中，传说往往会吸收相关史料而增添不少细节。如本文讨论的“禹兴西羌”传说，即可视作一史实之素地。汉初陆贾《新语》、司马迁《六国年表》记载的“禹兴西羌”传说，实未包含禹降生地石纽等信息。至扬雄《蜀王本纪》、谯周《蜀本纪》以及《吴越春秋》始见禹生石纽传说，到皇甫谧《帝王世纪》、常璩《华阳国志》又补入夷人传说，所增添的不少带有蜀地色彩的文本内容很可能是吸收了蜀地古史传说。西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时大禹传说的主体内容基本定型，后世流传的大禹传说多本于此。

夏代史料极为稀少，使得任何有关夏禹的记载，包括传说在内，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为史家所用。但需要警惕的是，传说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仅据《史记·六国年表》或《帝王世纪》等记载的“禹兴西羌”传说，申论禹与西羌种种关系的做法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注释：

- ①⑩冯汉骥：《禹生石纽辨》，见张勋燎、白彬编：《川大史学·冯汉骥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9页。
- ②谭继和：《禹生石纽简论》，《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
- 蒙默：《“禹生石纽”续辨》，《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 ③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 ④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 ⑤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周书灿：《由“禹兴西羌”说论及大禹传说的发生与重构》，《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陈嘉礼：《芒芒禹迹：大禹传说源流考》，香港浸会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杨栋：《“禹生石纽”传说的文化阐释》，《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
- ⑥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1，223—227页。
- ⑦杜美娟、刘宗迪：《“禹兴西羌”说考辨》，《南方文物》2024年第1期；邱月：《禹兴西羌：文化交错地带的民族互嵌与历史心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 ⑧崔建华：《秦汉时代大禹传说与中国

认同的巩固及拓展》，《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⑨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8页。
 ⑩胡鸿：《华夷》，见陈侃理主编：《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28—229页。
 ⑪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28页。
 ⑫周书灿：《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层累说”的再检讨》，《文史》2011年第1辑。
 ⑬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见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页。
 ⑭王国维：《古史新证》，见《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广东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17-1339.
- [3]班固.白虎通疏证[M].陈立,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166-168.
- [4]吕不韦.吕氏春秋集释[M].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284.
- [5]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陆贾.新语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43.
- [7]桓宽.盐铁论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333-334.
- [8]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杨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71.
- [10]释僧祐.弘明集[M].李小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赵晔.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周生春,辑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19:95.
- [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975.
- [14]皇甫谧.帝王世纪辑存[M].北京:中华书局,1964:49.
- [15]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198-199.
- [16]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5:218.
- [17]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80.
- [18]酈道元.水经注校证[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827.

The Legend of Yu Rising from the Western Qiang: A Reinterpretation of Its Historical Sources and Textual Lineages

Wu Yugui, Chen Zhuo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to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Six States (Shiji)*, Sima Qian advances the theory that imperial enterprise often arose in the northwest, citing the legend that Yu the Great rose from the Western Qiang. This is the earliest record in official histories that explicitly associates Yu the Great, the Xia dynasty's founder with the Western Qiang. Most scholars trace the legend of Yu's rise from the western Qiang to Lu Jia's *New Discourses: Method and Affairs*. However, it is frequently overlooked that Lu Jia likely adapted this claim from an earlier source, *Mencius: Li Lou II*. Pertinent references to the *Mencius* as the ultimate source for this legend, as indicated by Pei Yin in his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hiji jijie)* and later by the Qing scholar Jiao Xun in *Mengzi zhengyi: the Correct Meaning of the Mencius*,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modern academia. From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legend of Yu's rising from the Western Qiang evolved into two distinct textual lineages. One lineage maintains the narrative core unchanged, using it primarily to elucidate the principles of sage rulers and virtuous ministers. The other lineage, while preserving the core premise of Yu's origin in the Western Qiang, gradually supplements the legend of Yu with additional details, such as information about his paternal and maternal lineage and narratives of his birth, while adding a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 of the Shu area. Most of the later circulating versions of the Yu legend were based on the second lineage. Neither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asic Annals of Xia* nor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Treatise on the Western Qiang* adopted this legend. This omiss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utilization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ources and reflects the cautious and critical attitude adopted by both Sima Qian and Fan Ye toward this legend.

Keyword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Six States*; *Mencius*; the legend of Yu rising from the Western Qiang; historical source; textual lineages

[责任编辑/晓 东]